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晚清

传教士与儒家经典研究

胡瑞琴 著

齊魯書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晚清

传教士与儒家经典研究

胡瑞琴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传教士与儒家经典研究/胡端琴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12

ISBN 978-7-5333-2561-9

I. ①晚… II. ①胡… III. ①传教士—研究—中国—清
后期 ②儒家—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B975 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2062 号

晚清传教士与儒家经典研究

胡端琴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561-9

定 价 35.00 元

前 言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的首要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贡献了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不仅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而且必须要理解和研究中国积淀数千年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中国自从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策略后，以儒家典籍为基础的文化思想长期以来就被历代王朝君主确立为整个社会的精神力量，孔子自然也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灵魂象征。因此，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人们改奉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当艰难的。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要“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满腔热情，却遭遇了儒家思想的严厉“阻挡”。起初他们以为穿起中国人的衣裳就可以取得突破，但后来经过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他们才发现，如果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研究儒家经典，了解中国人文化构成的心理特点。于是便有了儒家经典与基督教经典进行的高端对话。对这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缕析，是开通文化平等对话、互补、交流最有效的方式。传教士们对儒家经典的刻苦钻研，成效是极其显著的。他们研究所认识到的儒家思想境界，或许会让我们有些惊讶。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就说过，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的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四书”、“五经”与其



他著作相比，不仅在文学上兴味隽永，文字上引人入胜，而且还对千百万人的思想施加了无可比拟的影响。由此看来，这些书所造成的影响，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也认为，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是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注释者、解释者。过去孔子是中国人中的神圣，现在正如所有的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了人类最美的理想。他告诫在华的传教士说，只有透彻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是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担任的职务相称的。

的确，传教士既是传播异于中国传统信仰的布道者，亦是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输入者。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又被视为与西方列强相关联的既得利益者。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沉淀与思考，中国人民对他们的看法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即传教士的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不仅在传教方面，而且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传教士这几重印象的复杂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迎拒，也影响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效果。

只有历史能见证他们的言行真诚与否，是真理，光芒就将永远闪烁！

胡瑞琴

2011年5月30日于烟台

绪 论

一、西方传教士研究概况

历史学家陈垣把基督教入华之经过概括分为四期：以唐代贞观九年（635）阿罗本传入之景教为第一期；元代盛行之也里可温教为第二期；明代耶稣会士沙勿略传入之天主教为第三期；清代马礼逊传入之耶稣新教为第四期。^① 在这个总结中，分别提到三位传教士的名字，即阿罗本（Alopen）、沙勿略（Francois Xavier, 1506—1552）、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们作为基督教在各个时期传播的先锋或开拓者，“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②。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传播基督信仰，而且还积极地参与近代中国在各个时期的各项社会活动。尤其是晚清传教士几乎融入了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变革，科技创新、政治制度、法律、通讯、国际贸易、赈灾、创设学校和医院等所有领域都显示出他们

①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神学志》，第十卷第四号，1924年，第17—23页。

② [英] 马礼逊夫人著，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的踪迹，并且几乎都具有开创性。所以，有关传教士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很有意义、内容也是相当丰厚的研究课题。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指出：“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而又最有意义的人物。”^①也恰在这时，中国学术界开始积极地研究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

早在1964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李时岳撰写的《李提摩太》。这是一本传记性的著作，受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本书对传教士的评价基本上是批判性的。之后关于传教士的研究几乎陷入了停顿。1981年，顾长声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陈旭麓评价说，它“填补了中国近代史著中关于传教史的一个空缺”，并且“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蓝图”。^②李喜所也称赞本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了本书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③之后，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1985年，顾长声又出版了《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此书后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再版。该书对近代一个半世纪来华的三十多位著名西

① S. W. Barnett and Fairbank,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李喜所：《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方传教士进行了评述。此后,随着更多信息资源的开放,对传教士的研究也成为—个热门话题。对传教士专题性的论著日渐增多。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李瞻、石丽东合著《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中山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梁元生著《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蔡锦图著《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出版);英国史学家汤森撰写、王振华翻译的《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史静寰的《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本书全面地记述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在华期间的办学经历、教育理念、教育活动等。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从整体上考察了近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本书的出版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①与美国传教士有关的研究著作还有齐小新著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利用了一批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历史资源对特定历史时期展开横向文化比较”的研究。胡卫清著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夏东元认为它“不仅为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而且为整个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

^① 李喜所:《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视角”^①。杨代春的《〈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和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 2004 年出版）两本论著，均围绕《万国公报》这份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传教士创办的“时间长、内容多、影响大”的报刊，分析了它在近代中国的变革浪潮中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积极的作用。岳峰的《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则是以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为个案，对他的汉学成果进行了全面剖析。张西平撰写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主要以传教士的汉学水平、内容、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明清两个时期传教士的汉学成就进行了研究，资料之翔实丰富可谓壮观，是一本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传教士汉学思想的著作。谭树林撰写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年出版），以马礼逊在华的传教活动为主，对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开创性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把利玛窦看做是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那么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当属马礼逊，而且由马礼逊入华导致的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层次更深，影响更久远。”^② 2006 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编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著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出版），讲述了他 在华的生活经历、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等。还有叶隼撰写的《主体的变迁：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上海外语教育出

①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

版社 2008 年出版),也反映了德国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从 2004 年至 2010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周振鹤主编的大型系列丛书《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包括《马礼逊回忆录》、《花甲记忆》、《卫三畏生平及书信》、《李提摩太在中国》、《千禧年的感召》、《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狄考文传》、《朝覲东方:理雅各评传》等传记性作品,主要反映了马礼逊、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李提摩太、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狄考文、理雅各等诸位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风俗、政治等的解读、认识和贡献。其中有些是传教士本人亲自著述的,也有西方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撰写的,尽管西方学者所撰写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这些传记从某些角度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学界对传教士研究的范围从教会学校、科举制度、国民性问题、在华活动的情况到传教士在华的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文化的传播等全面展开,可谓百花齐放。在此不一一列举。就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比较性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也具有突破性进展。

二、传教士研究儒学经典的动机

自古代以来,儒学以其道德化的社会生活和悠久绵长的审美情怀,曾吸引四周之邦纷纷前来取经学艺。汉代的“独尊儒术”更是将儒家思想立于至高的地位。传教士从西而来传播宗教,较早地接触到中国文化,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传教士在宣教过程中发



现，他们必须面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这一对他们来说完全异质的文明形态、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与数千万的民众心灵中，因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故这种文化与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隔阂”不是可以轻易抚平的，要想使宣教获得成效必须在对中国文化加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适应”，“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就是这样被提出来的。基于这种考量，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加以观察、分析与研究就成为西方传教士很自觉的一种行为。旁观者清，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一种来自局外旁观的冷静观察，对我们体认儒学、体认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来说，同样是不能轻易绕过的。

明清之际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意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调和、会通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礼俗、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利玛窦采用儒冠儒服，认真研究中国文化，极力吸纳儒家学说，借助中国经典中的“天”、“仁爱”等观念宣教，试图让作为“异教徒”的中国人觉得不是要强加给他们一种外来宗教。利玛窦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总体上是相合的，因此可以实现互补，他说：“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 and 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①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有效的，开创了自利玛窦 1582 年来华到 1775 年耶稣会解散共一百九

① [意] 利玛窦、[比] 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 页。

十多年成功的传教事业，但后来有近百年的禁教。

自 19 世纪初期开始再次东来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时仍然要面对如何调和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的的问题。“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与儒学之间以激烈的冲突为主。……认为很难将孔子和耶稣混为一谈，要么孔子，要么耶稣，二者必居其一。”^① 但理雅各、慕维廉（Muirhead William, 1822—1900）等传教士已明确地表示必须了解儒家思想、了解中国古代经典，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并采取了将基督教义附会儒学的办法。^② “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起，粗通汉学的传教士们‘援儒入耶’，通过宗教宣传品，尝试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③ 林乐知（Yong John Allen, 1836—1907）、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理雅各、丁韪良、李提摩太、安保罗（Paul Kranz, 生卒年不详）等人面对在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传播基督教、处理基督教与儒学关系的问题时，继承了利玛窦等人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又明确提出“孔子加耶稣”思想。传教士要根据“孔子加耶稣”的策略对儒学加以附会与利用，就需要对儒学进行认知、了解与研究。因此，他们发表了一些研究基督教与儒学关系的著作，论证基督教与儒学并不抵触，论证基督教与儒学相近相合。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认为：“儒学包含了所有中国的教义和实践，他已经成为中国人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特色。因此，儒学是理

①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3 页。

② 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3—264 页；孙邦华：《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孔子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③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4 页。



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钥匙。”^①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Joseph Edkins)^② 也说:“中国经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无异于基督徒心目中的《圣经》,英语诗歌专业学生心中的莎士比亚,伊斯兰教徒心中的《可兰经》。”^③

传教士正是看到儒学在中国社会和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对儒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探究”^④。

三、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研究的主要成果

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时间。它主要有两个时期:17—18 世纪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期和 19 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期。二是翻译方式。从翻译方式上看,传教士的翻译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把经典著作翻译成西方文字,一种是进行中国文字的官话(白话文)翻译。在翻译过程中,17—18 世纪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

^① Ernst Faber, *A Systematical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1875. p. 100.

^② 艾约瑟 (1823—1905), 伦敦会传教士, 英国汉学家, 1848 年来华传教, 1880 年任中国海关税务司通译。艾氏的汉学著述、译著颇丰, 代表作有《代数学》、《中国的宗教》、《关于鸦片或中国罂粟的史料》、《中国的佛教》、《中国在语文学上的位置》、《中国通货》等。

^③ 转引自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53 页。

^④ 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29 页。



期主要以拉丁文为主,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期则以西方文字的多样化和内容深刻而见长。三是研究论著。通过比较基督教经典《圣经》和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发表众多的论文、研究著作,获得对两种文化或思想的相近或相似以及不同之处最直接的碰撞、对话,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较强的思想和文化动力。

1. 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

(1) 17—18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概况。

最早翻译“四书”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 1543—1607),他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其原稿现仍保存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①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个在中国本土对儒家经典著作“四书”进行翻译的人。^②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他和同伴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3—1739)等对《易经》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研究。白晋研究手稿有法文和中文等文字。^③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1610年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他以拉丁文翻译了“五经”,并在杭州刊印。不过这个译本至今也未见到,不知落于何处。伯应理(Philippus Couplet, 1624—1693),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1662年他和同伴共同以拉丁文翻译了《大学》和《论语》的前五章,为书起名为《中国箴言》(*Sapientia Sinica*)。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① Knud 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00—1800), Bulletin 1, 1979. p. 9.

②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1625—1696), 意大利传教士, 1671 年返回罗马的旅途中翻译了《中庸》, 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moralis*), 被认为是“全译《中庸》的第一人”^①。殷铎泽、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 1624—1684)、鲁日满(Franciscus de Rougemont, 1624—1676)、伯应理署名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于 1687 年在巴黎出版。此书的副标题是汉文“四书”直译。^②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 1585—1658)撰写了《大中国志》。从时间上看, 他是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人。意大利人卫匡国(M. Martini, 1614—1661)著有《中国上古史》, 他在这本书中对“四书”、“五经”作了介绍。在这本书里, 作者第一次向欧洲公布了六十四卦图, 从而使西方人对《易经》有了更直观的理解。^③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 1651—1729)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的全部, 这在当时可算“中国经典稍完备的译本了”^④。1698 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雷孝恩(Joan Bapt Régis, 1663—1738), 其著作在其故后于 1834 年和 1839 年先后在斯图加特出版, 即两卷本《易经》拉丁文译本, 书名为《易经——中国最古之书》(*I-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 1689—1759)于 1722 年抵达澳门, 他被认为是耶稣会士中学识最鸿博的人, 他用法语翻译并注释《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等。1687 年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华刘应(Mgr Clandus de Vissdel ou, 1656—1737)对

① 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 2004 年版，第 212 页。

②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4 页。

③ 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 2004 年版，第 211 页。

④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0 页。



《易经》进行注释，并把《尚书》译为拉丁文。

(2) 19 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儒学经典的翻译。

晚清新教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热情依然不减，而且文字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理雅各，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1856 年他计划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拟在译文里附上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1861 年，理雅各所译的“四书”分 1、2 卷依次在香港出版。到 1862 年，在王韬帮助下理雅各开始翻译“五经”。1865 年《尚书》译竣，称为《中国经典》第 3 卷。1871 年《诗经》译成，称为《中国经典》第 4 卷。之后《春秋》、《易经》、《礼记》以《中国经典》第 5、6、7 卷陆续出版。如理雅各这样系统完整地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情况并不多见。英国著名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曾赞美理雅各说：“50 余年，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① 马歇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1），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9 年译出《论语》英文版。马礼逊，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12 年译出《大学》英文版。柯大卫（David Collie，?—1828）于 1828 年出版了《四书译注》。1891 年《诗经》在英国出了两种译本，一种译本由传教士詹宁斯（M. A. William Jennings）完成。他所译的诗在汇成集子前曾陆续刊登在香港的《中国评论》上。另一种译本是阿连璧（Clement F. R. Allen，1844—1920）于 1891 年出版《诗经——中国的诗集》。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法国人，他先后完成的译著有《四书》（1895）、《诗经》（1896）、《书经》（1897）、《礼记》（1899）。顾赛芬的翻译特点是

^①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6 页。



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由于拉丁语的结构更自由一些，所以使之几乎能逐字逐句地直译汉语原文，并与法文、汉文对照排印。“他的翻译严格忠于当时官方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没有做任何独出心裁的解释或个人的评论”^①。花之安，1865 年受德国礼贤会派遣来华传教。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爱好，花之安极力推崇耶稣会士所主张的“孔子加耶稣”的传教思想。他热衷于对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研究，并把《论语》、《孟子》翻译成德文。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传教士，1899 年来山东青岛传教，1920 年回国，1924 年成为汉学教授。在华期间，他努力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考察，对“中国生活全体之和谐精神”叹为观止，决心要“研究此种精神之起源”。^②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他先后创办“礼贤书院”和“尊孔书社”，并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开始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他先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成德文。“他那认真细致尤其是文笔优美的译文为本世纪欧洲适当地接受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③。

（3）儒家经典的白话文翻译。安保罗则是将“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即“四书”《本义官话》，开创了学生学习儒家经典的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2. 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著述

传教士对儒学研究的学术著作很多。他们的译著不仅是一种

① 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 2004 年版，第 321 页。

② 转自《中德关系史文丛》，《卫礼贤行述》，青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 页。

③ [德] 夏春瑞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